

开启“启蒙之蒙”

——与王治河樊美筠对话第二次启蒙

鲁枢元

内容提要 “启蒙”如今仍是当下中国社会政治界、思想界乃至文学艺术界一个显突而又沉重的话题,且充满意见分歧。旅美学者王治河樊美筠的新著《第二次启蒙》认为:西方那种以工业化、现代化为指归的正统启蒙理念已经危机四伏、陷阱重重,甚至已经开始走向反面;从社会实践看,正统的启蒙理念对地球的自然生态、人类的生存环境、人类情感与精神领域以及不同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和谐共处,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人们应当正视现实、接受教训,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世界观,启动一次针对此前启蒙理念的启蒙,在前进中建设一个新时代。本文作者在一个更为开阔的时代背景与学术视野中,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剖析,并得出“后现代如何对待前现代,西方如何看待东方,事关地球人类今后的命运”的看法。

关键词 启蒙 怀特海 第二次启蒙 建设性后现代 生态文明

鲁枢元,苏州大学生态批评研究中心教授 215123

1637年,勒内·笛卡尔(Rene Descartes)写了一本书《方法论》,从而创建了现代性思维模式;小约翰·柯布(J·Cobb)说:1925年,怀特海(A·N·Whitehead)写了一本流传很广的书《科学与现代世界》(science and Modern World,中文版译为《科学与近代世界》),书中认为“现代性思维模式不再适合于当今时代”,并暗示自己的思想适用于现代之后的事物。大卫·格里芬(D·Griffin)继承怀特海的传统并发展出一种“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1]。两本书,300年,分别开启了两个时代。

针对现代社会存在的诸多问题,表达了深深的忧虑。

比如,“科学沙文主义”。怀特海指出:科学并不永远是对的,宗教并不永远是错的;就各自的对象而言,“科学所从事的是观察某些控制物理现象的一般条件,而宗教则是完全沉浸于道德与美学的玄思中”,一是求真;一是求善、求美,二者不相上下^[2]。

比如,“专业化”。怀特海站在有机整体论的立场上指出,专业化的做法“在未来的世界中则将对公众贻害无穷”,“每一个专业都将进步,但它却只能在自己那一个角落里进步”,“社会的专业化职能可以完成得更好、进步得更快,但总的方向却发生了迷乱。细节上的进步只能增加由于调度不当而产生的危险。”^[3]

比如,竞争的恶果。怀特海斥责道:“在过去三个

早在20世纪20年代,怀特海就在上述那本书中

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保护与文化认同困境

季中扬

内容提要 与有形文化遗产保护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始终伴随着诸多争议,尤其是空间保护,其中暗藏着非常敏感的文化政治议题:文化变迁过程中的权力控制,以及文化认同与文化冲突等。就国内“非遗”空间保护实践而言,由于保护区内居民缺乏文化认同的内在需求,面对强势的外来文化,其文化选择往往受制于功利驱动。对此,一方面应该正确认识发展与保护的关系,理解文化变迁、转型的必然性,以及保护区内居民文化选择的合理性;另一方面通过文化专家的恰当介入,以接受对象的立场、视角、话语融入性地开展教育、培训工作,维护保护区内居民的文化自信,帮助他们保持传统文化的生命力,调适文化的现代性转型。

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 空间保护 文化认同

季中扬,南京农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210095

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后 210046

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往往只能存在于特定的时空中,一旦其赖以生存的整体文化生态遭到破坏,保护充其量只是一种“临终关怀”。针对这个困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 1998 年发布的《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条例》中首次明确提出对“文化空间”进行保护,即对特定文化形态的整个生活空间进行整体性保护。在首批公布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19 个代表作中就有乌兹别克斯坦的博桑地区、俄罗斯的塞梅斯基、多米尼加的维拉·麦拉康果斯等 5 个文化空间。与有形文化遗产保护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始终伴随着诸多争议,尤其是空间保护,其中暗藏着非常敏感的文化政治议题:文化变迁过程中的权力控制,以及文化认同与文化冲突等。在西方,既

有人主张“新的差异文化政治”,提出“以多样性、多元性和异质性之名抛弃单一和同质”^[1],也有人认为“在目前条件下,真正的文化多元化不再可行。”^[2]甚至一些西方国家由于担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会导致种族与宗教冲突,并不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03 年发布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3]。国内“非遗”空间保护实践中是否遭遇了文化认同问题,以及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这是本文思考的出发点。

一、“非遗”空间保护的国内实践

国内“非遗”空间保护实践发端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有两种主要形态,一是直接来自西方模式的生态博物馆,二是自主规划、建设的文化生态保护

加入外籍的华人作家 非母语创作的归类问题

倪婷婷

内容提要 以国籍区分国别文学的规则并不适合一些成年后移居国外的华人作家作品的归类和定性,无论是否用中文写作,这些作家在去国之前文化习性和思维方式业已形成,其作品也反映出根深蒂固的中国意识。从中国文学研究的立场来看,作者的外籍身份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重要,作品是否反映出中国式的情感意绪、价值观念才是关键所在。这些作家的非母语作品作为主流的中国汉语文学以外的一种特殊样貌,拓展了中国文学的边界,也丰富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文化精神内涵。

关键词 华人作家 非母语创作 中国文学 文化身份

倪婷婷,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教授 210046

除了文学书写的语言之外,作者的身份通常是影响国别文学定义的重要因素。一般而言,中国文学理应是中国人书写的文学,那么,如何定义中国人的概念呢,按血缘,按文化,还是按法律呢?以具体作家而言,如果以法律资格衡量,像张爱玲这样后来做了美国公民的作家就应该算是美国作家,像高行健这样入了法国籍的作家就是法国作家,如果再加上他们还用移居国语言写作,这个归属判定似乎应该没有什么疑问。但是,张爱玲和高行健真的不属于中国了吗?

中国图书馆的文献分类法规定:“文学作品则应依著者的国籍(国家)作为分类的依据。”也就是说,作品的中国文学性质是按照作者是否具有中国公民

的法律资格来认定的。作者只要拥有中国国籍,无论用什么文字,反映什么生活内容,他的作品都属于中国文学的范畴。《中国图书馆分类法使用手册》将文学作品分成诗歌韵文、戏曲、戏剧、小说、报告文学、散文等几种体裁,这些类别的文献都必须以“国籍”为中心确定自己的位置。以小说为例,“在文学范围内,中国小说按作者国籍与中国文学成类”^[1],这属于原则性的规定。可见,就文献分类而言,作者的国籍对文学作品类别的区分起到至为关键的作用。这种规定如果仅限于图书馆的文献分类,由于它有较强的可操作性,未尝不可;然而,这样的分类规定也会影响到一般读者对阅读作品的选择,甚至影响到一些文学研究者对作品性质的判定,其结果难免带来张冠李戴的尴尬。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现当代作家外语创作论》(项目批准号 13JJD750009)阶段性研究成果。

平民理论与当代平民文学

——兼论当代文学史三维坐标系的构建

刘志权

内容提要 “平民”作为社会学概念,历来缺少基于精神层面的平民个体特征的学理研究。本文从平民“权力相对缺失”这一根本特征出发,通过卢梭以降的西方诸多理论,探讨了平民自我以生命感受和生存伦理为核心的双重性、矛盾性和复杂性,并以此为理论基础,结合中国新时期以来当代小说创作的实际情况,进一步阐发了平民文学的美学特征及实践意义,并进而提出了构建一个启蒙文学、官方文学、平民文学三足鼎立的当代文学史三维坐标系的构想。

关键词 平民立场 平民自我 平民文学 三维坐标系

刘志权,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210097

“平民”这一概念主要局限于社会学领域,对其精神特征缺少必要的界定。这一概念在文化或文学领域以平民化、平民主义、平民文化、平民意识、平民精神、平民立场等名词出现时,基本没有统一的理论内涵,总体特点是,根据需要直接赋予相关概念以自己的内涵,却不探讨“何以如此”。因此,“平民”几乎失去了学理上的意义。以“五四”时期就频繁使用的“平民文学”概念为例,周作人强调平民精神以普遍和真挚为原则;胡适视之等同于民间文学、通俗文学、白话文学;鲁迅则认为是真正解放的平民所创作的文学。学者们对这一分歧都有认识^[1],这一现象一直延续至当下的市民文学、打工文学、底层写作等,

引用者众,却歧义丛生。内涵的模糊导致了平民概念使用上的模棱两可,也影响了对这类文学的研究。

正确认识平民首先需要着眼于历史。平民概念起源于西方,可追溯到希腊城邦制形成之前,主要是作为“贵族”的对立面存在的(同时,也有别于完全没有权利的奴隶和农奴,因此,也就有了争取权力的余地)。如杨师群所言,古希腊罗马社会可以说就是在平民与贵族的政治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斗争的核心始终是围绕权力。无论是梭伦改革前后的海岸派以及山地派,保民官制度的设立,或者公元前471年成立的平民大会,平民与贵族斗争的主要诉求都是平等的社会地位和相关权利^[2]。以此为特征,“平民”群体处于动态发展的历程之中。它可以包括农村地主、财政官吏、金融家、律师、医生、大学教授,也可以包括

本文系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092WC010)及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PAPD)中期研究成果。

暧昧与混杂:沦陷时期周作人精神症候分析

——以上海沦陷时期文学期刊为视点

李相银

内容提要 周作人在上海沦陷时期的文学期刊上受到热捧是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他在《古今》、《杂志》等期刊上的相关文字显示出与过去迥然有别的精神混杂面向。在“春秋笔”与个人苦衷之间的自私选择造成了周作人“落水”之后的道德隐忧。为排遣这种隐忧,周作人一方面借助《古今》展开政治交游,对汪精卫谄媚示好;另一方面又在《苦茶庵打油诗》中进行忧虑自评。这反映在“破门”事件与片冈铁兵“扫荡反动老作家”事件之后,周作人对自己进行重新定位。事件的爆发证明周作人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层面上寻求中日之间、侵略者与被奴役者之间文化认同的失败。因此,《苦茶庵打油诗》是周作人的自我总结陈辞。周作人的文字代表了沦陷区“落水”文人与官员局促难安的精神状态。在背离民族道义之时,尴尬、暧昧、回避、辩解、神圣化等等成为其寻找合法性、自我解脱时的精神表现。

关键词 周作人 上海沦陷时期 文学期刊 混杂面向

李相银,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 210097

周作人“落水”的结果是他完全颠覆了前半生的自己——一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基本价值立场:民族独立与思想独立。“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隐忧一直无言地存在着。在谈及“忧患时的闲适”时他说:“总之是在一个不很好的境地,感到落水在后面,对于目前光景自然深致流连。”^[1]为了消解这种悠远而恒定的畏惧,周作人开始为自己、为“同道中人”寻求合法性的力量。沦陷时期的上海文坛为他提供了比较合适的发声场所,《古今》、《杂志》上的相关文字分别承担了周氏政治交游与文学自评的功能。他与汪

精卫等在《古今》上的相遇以及对汪氏的美誉神化表明了他的政治盘算。而在“破门”事件与“反动老作家”事件之后,花甲之年的周作人有意借助《苦茶庵打油诗》的“前言”与“后记”重塑个人的文化象征意义,进而确认个人的道德地位。

一、“春秋笔”与个人苦衷

上海全部沦陷后,文学生态进一步恶化,民族话语被迫噤声,但文化人并未束手待毙。在沉寂数月之后,不同立场的文化人开始办刊应对,一时间杂志风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上海沦陷时期文学研究》(10CZW057)、江苏省第四期“333工程”培养资金资助项目(BRA2012180)、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2013M531380)、江苏省博士后科研资助计划(1202107C)阶段性成果。